

试析美国政府对外文化传播的“他者”改造观

■ 林 媛

美国政府在对外文化传播中抱持“他者”改造观。本文认为,“他者”改造观是一种西方“本体论”的哲学观,并深受“美国例外论”的影响。“他者”改造观使美国政府的对外文化传播实践呈现出非客观性、非正当性、非双向性的特点,对美国的对外文化传播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一、“他者”改造是美国政府对外文化传播的本质特征

从政府对外文化传播的历史来看,美国起步相对较晚,直到1938年,美国政府设立了“文化关系司”(Division of Cultural Relations),才正式开启了政府对外文化传播的进程。然而,美国却后来居上,通过“冷战”时期的发展,逐渐成为政府对外文化传播的“领头羊”;“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府的对外文化传播活动一度衰落;2001年的“9·11”事件之后,美国政府再度掀起对外文化传播的热潮。

无论是“冷战”时期,还是后“9·11”时期,美国政府的对外文化传播尽管在主要对象、目标诉求等方面有所变化,但其内在逻辑却始终未变,即以美国的自由民主价值观改造“他者”,形成主体(美国),向客体(“他者”)单向度的文化传播关系。在这种文化传播过程中,美国政府所要达成的终极目的是消除“他者”与“自我”的相异之处,完成“自我”对“他者”的同一。也就是说,美国政府在对外文化传播中抱持着一种“二元对立”的“他者”改造观。

所谓“他者”,是一个哲学概念。但长久以来,西方哲学传统是以“本体论”为特征的,“他者”是被掩盖和忽视的。直至在西方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伴随着种种“异化”现象的出现,现象学的研究才开始注意到“他者”的存在,并赋予“他者”以哲学意义。然而,这个“他者”却是“自我”的陪衬,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和能动性。事实上,“他者”即“差异”,与“自我”相伴而生,但长期以来都未能在西方哲学体系中获得应有的地位。西方哲学以追求“他者”的“同一”为目标,并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政治理念和行为的哲学依据。美国政府在对外文化传播中就表现出了建立在西方“本体论”哲学基础上的强烈的“他者”改造观。美国政府的目的是消除“他文化”与美国文化的“差异”,将“他文化”纳入到美国文化的发展体系中,因此,“他者”改造观就成为美国政府对外文化传播的本质特征。

二、“他者”改造观的历史文化成因与“美国例外论”

在美国政府的“他者”改造观中,“他者”就是哲学意义上的“异”。由于“他文化”同美国文化存在差异,那么“他文化”就理应失去独立存在的必要性,而应该“同一”于美国文化。美国的文化优越感来源于“美国例外论”,这也是美国政

府“他者”改造观形成的历史文化原因。

“美国例外论”是美国人自我“身份”的认知。这种身份的获得,是在“自我”与“他者”,即美利坚民族与其他国家和民族进行对比、互动的过程中完成的。这一身份认同的核心是:较之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美利坚民族具有“排他性”的优越性。也就是说,“他者”的存在只是为了凸显美利坚民族“独一无二”的优秀与先进。而这种特殊“例外论”之所以在美国形成,其主要原因如下:

1. “清教”思想的影响。早期登陆北美大陆的“清教徒”是美利坚民族“清教”思想的奠基者和传播者,他们“都表现出强烈的命运感、上帝选民感以及特殊使命感”^①。这些早期移民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上帝将北美大陆赐予他们,是希望他们在这片土地上进行试验,创造新的美好世界。而且,在开发“新大陆”的过程中,移民们战胜了无数挑战,最终建立了新世界,这使移民们更加相信上帝对他们的庇佑,同时也强化了他们“上帝选民”的特殊身份认知。因此,在美利坚民族尚未形成之前,深受“清教”思想影响的早期移民就将“自我”——“上帝的选民”与“他者”——“上帝的弃民”进行了比较,并在这种互动关系中确定了“自我”身份的想象——作为被上帝拣选并庇佑的“新人”,具有天然的、与众不同的特殊性。这样的身份认同在被传承的同时,也深刻影响着美国社会对自身的自然条件、移民社会和社会经历等一些问题的独特认知。

2. 自然条件的优越。北美大陆良好的自然条件为世人所称道,但从“美国例外论”的视角出发,自然条件如此之好是具有必然性的。美利坚民族认为,自己作为被“上帝拣选”的民族,理应获得上帝赐予的具有“神性”的“新大陆”,而与此对应的是“旧大陆”,也就是欧洲。与欧洲“旧大陆”相比,美洲“新大陆”所拥有的丰厚的自然条件是理所应当的。

3. 移民社会的构成。自北美大陆被发现以来,陆续赶赴“新大陆”并主宰这片土地的各国移民使美国成为了一个典型的“移民”社会。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既与母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又在共同开发“新大陆”的过程中形成了具有美利坚特色的崭新的民族心理特征,从而诞生了一个崭新的民族——美利坚民族。这个民族认为自身具有无与伦比的包容性,任何其他的国家和民族都不具有这样的特殊性,从某种角度来说,美利坚民族认为自己简直就是一个“世界”,而不仅仅只是一个“国家”。

4. 社会发展的独特。英属北美殖民地取得了独立战争的胜利之后,旋即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没有经历过封建社会的阶段,并在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长期保持了社会的稳定。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相比,这样的社会发展经历是

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的,无形中加强了美利坚民族“例外”的身份认同。

如上所述,至少四种因素对美利坚民族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尤其是“清教思想”这一因素使北美大陆早期移民将自己想象成为“上帝的选民”,从最初的身份认同上就与其他国家和民族进行了区隔,由此奠定了“自我”与“他者”区隔的基础。在自己“身份”是具有特殊优越性的这样一种认知基础上,美利坚民族认为自己是“例外的”,而且是一种绝对的、排他性的“例外”。时至今日,这种“美国例外论”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当美国政府进行对外文化传播时,呈现出了强烈的改造“他文化”的意愿,如果我们从历史文化的视角探讨这一现象的话,可以从“美国例外论”中寻找答案。

三、“他者”改造观在美国政府对外文化传播中的现实影响

美国政府的对外文化传播具有鲜明的指向性,即对“他者”进行改造。如前所述,这种“他者”改造观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属于西方“本体论”的体系范畴,其历史文化成因与“美国例外论”的关系密切。对于“他文化”,美国的衡量标准是:是否与美国文化存在“差异”?如果存在“差异”,美国就要对其改造,使其被美国文化所“同一”。可以说,“他者”改造观对美国政府的对外文化传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在现实中的表现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1. 传播态度的非客观性

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美国例外论”逐渐成为美利坚民族的“身份”认同。通过与“他者”的互动比较,美利坚民族认为自己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而其他国家或民族的文化是落后于美利坚民族的,因此“他文化”对世界文化所做出的贡献是可以被忽视甚至无视的。但事实上,文化具有多元性的特点。在现实世界中,国家有大小强弱之分,但文化却没有高低优劣。任何一种文化都有自身的特点,都是世界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尽管近代以来西方国家作为工业化进程的“领跑者”,使国际文化传播格局形成了“西强东弱”的局面,并且美国在国际文化传播领域中的强势地位尤为突出,但这些都理所当然地构成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一个国家对“他文化”抱持歧视甚至蔑视态度的依据。况且,正如俞新天教授所认为的:“文化传播如日月经天,江河泻地,即使弱势文化也会在一定条件下向外散发其影响,而且可能由弱变强。”^②然而,美国政府却一味地坚持对外文化传播的“他者”改造观,不能客观地认识“他文化”对世界文化

的有益之处和发展潜力。例如美国甚少关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化现代化进程,对中国文化的认知总是停留在古代文明的情境中,造成对中国文化发展的片面的、狭隘的理解,甚至是误解。

2. 传播手段的非正当性

在美国政府对外文化传播过程中,改造“他者”的目的决定了美国政府所采取的传播手段是强制性的。哈贝马斯认为,沟通应该遵循三个“有效性”原则,其中之一就是传播主体不应该使用强制性手段向传播对象进行传播,这种手段是不正当的。因为这种手段即使通过精心的打造,即使以“温情脉脉”的形式呈现出来,也掩盖不了其本质上的非正当性,例如,“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政府设立萨瓦电台在中东地区进行文化传播。萨瓦电台是在美国“反恐”的背景下产生的,针对阿拉伯青年播放以阿拉伯和美国流行音乐为主要内容的文化节目。以音乐吸引青年人,形势非常巧妙隐蔽,但其目的却是以美国的自由民主价值观改造阿拉伯世界的青年人。^③因此,在对外文化传播中,美国政府强制性的目的决定了其手段的非正当性实质,尽管它的表现形式仿佛是正当、合理的。

3. 传播方式的非双向性

世界文化是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文化间的相互传播、融合是推动世界文化发展进步的有效方式。但美国政府的对外文化传播方式却呈现出单向度的特点,其主要原因就在于美国政府改造“他文化”的目标宗旨。从美国政府的角度出发,“他文化”就是与美国政府存在“差异”的文化。无论是从前的苏联、东欧地区,还是现在的伊斯兰世界,等等,他们的文化都因与美国不同而不如美国优秀、先进,所以美国文化应该成为“他文化”学习、效仿的对象,并在此过程中实现美国文化对“他文化”的“同一”,对传播对象——“他文化”的能动性视而不见。然而,“他文化”是客观存在的,并且具有主观能动性,美国政府的非双向式的传播方式违反了文化间互惠理解的传播规律,必然招致“他文化”的强烈不满和反对。

在对外文化传播的过程中,美国政府的核心目标是改造“他文化”,将“他文化”的发展纳入到美国文化的运行轨迹之中,完成哲学意义上“自我”对“他者”的“同一”。当我们从历史文化的视角对“他者”改造观进行剖析时,不难发现“美国例外论”是这一观念形成的重要原因。同时,“美国例外论”强化了美国文化优秀的想象和改造“他文化”的意愿,使美国政府在对外文化传播中有失偏颇,其传播效果也受到了负面的影响。

注释:

① [美]罗伯特·汉迪著:《一个基督教的美利坚:新教希望与历史现实》(Robert T. Handy, *A Christian America: Protestant Hopes and Historical Realities*),牛津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7页。

② 俞新天:《构建中国公共外交理论的思考》,《国际问题研究》,2010年第6期。

③ 参见忤胜奇著:《布什政府中东公共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第257-258页。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部思政部)

【责任编辑:李立】